

邊緣擾動中心

——一個觀察晚清民國耶穌會史的視角

The Periphery Stimulating the Centre: A Perspective on the Study of Jesuit History in Modern China

王 皓

WANG Hao

作者簡介

王皓，上海大學文學院副研究員。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WANG Hao, Associate Professor,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hanghai University.

Email: wanghaotang2005@163.com

Abstract

This is a summary of the author's doctoral dissertation in 2017 at Fudan University, which focuses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modern Society of Jesus and modern scholarship both in China and in Europe. Compared with either the Jesuits during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or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the late Qing and Republican eras, the new Society of Jesus has received little attention from scholars of Chinese history and remains peripheral. Taking as its case studies the three fields of Meteorology, European Sinology, and Chinese Historical Studies, this essay analyzes the position and role of Jesuit scholarship in both Chinese and European contexts and demonstrates how the periphery influences the center as well as the different types of interactions. The meteorological activities of the new Society of Jesus, for example, stimulated the formation of local academic centers of meteorology in China. The new Jesuits' Sinology provided European Sinology with its primary research foundation and constituted the upper links of the chain of academic production. In return, the Sinology of the new Jesuits, as used and critiqued by Chen Yuan, played an essential role in establishing the paradigm of historical studies of religions in modern China.

Keywords: Periphery, Centre, Society of Jesus, Jesuit History, Modern China

新耶穌會：中國歷史上一個複數的邊緣

明清天主教史是中國基督教史的重要組成部分，耶穌會士則是這段歷史當仁不讓的主角之一。可是，對明清之際的中國來說，中西相遇的歷史並非時代主線。客觀而言，耶穌會士來華只能算是同時代中國的一段“小歷史”。^①相比明清之際的耶穌會，晚清民國時期的耶穌會就顯得更為邊緣。簡要地說，康熙朝發生的禮儀之爭直接導致了在華耶穌會傳教活動的中斷，此後，耶穌會士的合法活動主要被限定在欽天監和宮廷之中。1773年，由於捲入了歐洲各國的政治鬥爭，耶穌會被羅馬教廷解散。這一天主教修會於1814年被恢復，並且在1841年重新派遣傳教士來華開展教務。

宗教的傳播也帶動了學術在中西之間的流傳和互動。本文主要從學術的角度分析新耶穌會士的來華對中國學術和歐洲學術產生的影響。不必諱言，新耶穌會的學術活動對於中國學術中心和歐洲學術中心來說，都是不折不扣的邊緣存在。然而，這個“邊緣”和兩個“中心”之間的聯繫和互動，卻具有相當程度的隱微特徵，值得探討和論述。

耶穌會的兩次來華都與中西之間政治權勢的消長有密切關係。新耶穌會來華時，它在中西之間的處境已經與原來有很大的不同。此時，在以自由和理性為時代特徵的歐洲，宗教已經呈現邊緣化的態勢。弔詭的是，在歐洲勢力向中國擴張的過程中，宗教團體卻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了世俗學術的載體，從而衝擊了中國的傳統學術，進而參與了中國學術的現代轉型。然而，現代學術所彰顯的理性特徵，又決定了由傳教活動所開啟的學術變革最終會被世俗的學術力量所反噬，宗教在中西學術發展的過程中都不可避免地被進一步邊緣化，可謂“雙重弔詭”。在此過

^① 張先清：《小歷史：明清之際的中西文化相遇》，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3頁。[ZHANG Xianqing, *Xiao li shi* (Tiny History)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 3.]

程中，新耶穌會處於一種多重的邊緣位置，它所參與的學術活動及其影響，亦可能隱而不彰。

發掘邊緣和中心之間的隱微關聯

熟悉晚清民國耶穌會歷史的學者，都知道新耶穌會的“江南科學計劃”。1872年8月，在郎懷仁（Adrien Languillat, 1808—1878）主教和谷振聲（Angelo della Corte, 1819—1896）會長的主持下，上海的耶穌會士在徐家匯召開了一次重要的會議，會議決定了在江南教區進行科學和文化研究的方案。這個方案主要包括四個部分：（一）在高龍鞏（A. M. Colombel, 1833—1905）神父領導下的氣象、天文、地磁等研究，建立觀象臺，並且將觀測結果彙編出版，寄往歐洲。（二）在韓伯祿（Pierre Heude, 1836—1902）神父領導下的博物學研究，建立博物院，將相關的動植物研究出版並且寄往歐洲。（三）在費賴之（Louis Pfister, 1833—1891）神父領導下的中國史地研究工作，包括中國天主教史和明清在華耶穌會士的傳記編纂工作等。（四）出版工作，擬用中文出版科學和護教雜誌。^① 後來，這一計劃在實施的過程中有所調整，但是基本框架沒有變化。到了1940年，《申報》將天主教在中國五大文化事業概括為徐家匯藏書樓及耶穌會士漢學研究、北堂圖書館、徐家匯觀象臺、震旦博物院以及北疆博物院，^② 除了北堂圖書館和北疆博物院地處平津之外，其他三者都體現了“江南科學計劃”的制度設計。

從現代的學術分科來看，耶穌會士所從事的學術研究涉及動物學、

^① J. de la Servière, *Histoire de la Mission du Kiang-nan* (Tome II) (Chang-hai: Imprimerie de l'Orphelinat de T'ou-se-we, 1914), 192-196".

^② 參見1940年《申報》11月28日第3張第9版，11月29日第3張第11版，11月30日第2張第7版，12月2日第3張第9版，12月12日第2張第7版，12月13日第3張第11版，12月16日第3張第11版。[See *The Shun Pao*, 1940.11.28, Page 3:9; 1940.11.29, Page 3:11; 1940.11.30, Page 2:7; 1940.12.2, Page 3:9; 1940.12.12, Page 2:7; 1940. 12. 13, Page 3:11; 1940.12.16, Page 3:11.]

植物學、地質學、氣象學、天文學、地磁學以及漢學研究等多種學科，並且成立了觀象臺、博物院和藏書樓等重要科研機構。習慣了分科治學的當代人，可能會對這種情形感到不太適應，但晚清民國耶穌會同時參與了不同學科的活動和發展，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近年來，學界對晚清民國時期耶穌會的學術活動逐漸重視，並且做出了較為深入的探討。此處不能全面梳理已有的相關成果，但是可以列舉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論著。例如戴麗娟、于樹香關於耶穌會士博物學的研究，^①吳燕關於耶穌會士觀象活動的研究，^②它們都具有相當的研究深度，是探討此類問題難以迴避的研究基礎。由於晚清民國時期耶穌會士所從事的學術活動涉及面較廣，而且其他學者已經在某些方面做出了紮實的成果，因此，筆者在關注這一問題時，有選擇性地聚焦於耶穌會士的氣象學研究、漢學研究和文獻搜集三個方面。這種關注的重點不是孤立地描述耶穌會士的學術活動，而是力圖將這些學術活動放在他們與歐洲學術中心和中國學術中心的關聯中來審視，從聯繫和互動的視角來對耶穌會士的學術活動予以定位和評價。

對晚清民國耶穌會學術活動的研究，筆者有三個框架性的思考。

^① 參見戴麗娟：《在“邊緣”建立“中心”——法國耶穌會士桑志華與天津北疆博物院》，《輔仁歷史學報》，2009年第24期，第229-256頁；戴麗娟：《從徐家匯博物院到震旦博物院——法國耶穌會士在近代中國的自然史研究活動》，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84本第2分（2013年6月），第329-385頁；于樹香：《法國“進士”逐夢東方：1914-1938年桑志華（Emile Licent）來華科考探險記》，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TAI Li-chuan, “Building the ‘Center’ on the ‘Periphery’: The French Jesuit Emile Licent and the Tianjin Musée Hoang Ho Pai Ho,” *Historical Inquiry of Fu Jen University*, no. 24 (2009): 229-256; “From Zikawei Museum to Heude Museum: The Natural History Research of French Jesuits in Modern China,”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vol. 84, no. 2 (June, 2013): 329-385; YU Shuxiang, *Faguo “jin shi” zhu meng dong fang*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Exploration of Emile Licent in China from 1914 to 1938)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20).]

^② 參見吳燕：《科學、利益與歐洲擴張：近代歐洲科學地域擴張背景下的徐家匯觀象臺（1873—1950）》，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WU Yan, *Science, Interest and Expansion of Europe: Zi-ka-wei Observatory (1873-1950) in the Context of the Territorial Expansion of European Modern Science*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13).]

一、從“邊緣和中心”的角度。上文已述，將耶穌會的學術活動置放在學術發展的脈絡下審視，往往只能將其視為支流。發掘學術邊緣和學術中心之間的具體聯繫和相互作用，首先是一種基礎性的史實重建工作。二、從“地域性和全球性”的角度。耶穌會士所從事的動物學、植物學、地質學、氣象學、天文學、地磁學以及漢學研究，看起來五花八門，實際上都是帶有“中國特色”的具有“地域性”的學術活動，而這一點正是這些不同門類學術活動的共性。與一般的歐洲學者相比，耶穌會士具有難得的在地性（locality），能夠在上述門類的學術活動中發揮比較優勢，從而在全球性的學術發展中填補來自中國的不可或缺的一環。三、從“制度性和偶然性”的角度。“江南科學計劃”發起時，其方案就包括將觀象研究資料和博物學研究資料寄往歐洲，這體現了學術邊緣和中心之間制度性的聯繫。除此之外，耶穌會的學術活動基本是以歐洲學術中心作為參照對象的，它的取向是“歐洲中心”的，這也是一個歷史事實。那麼，這些由外國人在中國所從事的現代學術活動，對中國的學術現代轉型產生了哪些影響，可能就不是這些學術活動的發起者和參與者所能夠預設的，因而帶有相當的不確定性。而這種偶然性與制度性一樣，都是歷史研究的重要對象。

在這個探討過程中，筆者發現，在中心和邊緣之間，有些聯繫是顯而易見的，有些聯繫是隱微而難察的，有些影響是直接起到作用的，有些影響則是間接而潛在的，這種不一而足的現象，恰恰體現了晚清民國時期耶穌會學術活動所引起的歷史波瀾多彩而又微妙。

邊緣擾動中心的多元形式

在本文中，筆者希望用氣象學、國際漢學和中國史學三個方面的具體案例，來展現晚清民國時期作為“邊緣”的耶穌會學術活動是如何“擾動”中國和歐洲兩個學術“中心”的。

晚清時期，上海的耶穌會士建立了徐家匯觀象臺，從而將現代氣

象學引入中國。此後，這一科學機構執中國氣象事業之牛耳長達半個多世紀，直到1928年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成立，中國氣象事業的主導權才開始逐步轉移到國人手中。就氣象學這門學科來說，從“西方發起衝擊”，到“中國有所回應”，持續了幾十年的時間。如果對比幾乎同時受到衝擊的日本，不難發現，日本對來自西方的現代氣象學的反應要比中國迅速和靈敏得多。因此，僅是梳理氣象事業從外人到國人這一權勢轉移的歷史過程，就有大量的史實有待釐清。以竺可楨（1890-1974）為代表的本土氣象學力量，大多是從歐美學成歸國的現代學人，他們與徐家匯觀象臺沒有直接的淵源。但是，他們在建設本土氣象事業的過程中，與既存的外國同行之間，產生了各種各樣的聯繫、合作和競爭。徐家匯觀象臺是耶穌會全球觀象網絡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的學術研究是以歐洲為本位的，自然稱不上是中國氣象學的“中心”。但是，它在中國現代氣象學發展史中的地位，顯然是至關重要的。^①在一定程度上，就氣象學而言，正是歐洲的“邊緣”促進了中國“中心”的形成，這是“邊緣”擾動“中心”的一個具體案例。

1892年，夏鳴雷（Henri Havret, 1848-1902）神父出版了他的《長江口的崇明島》（*L'île de Tsong-ming à l'embouchure du Yang-tse-kiang*），這是“漢學叢書”（Variétés sinologiques）的第一種作品。此後，直到1938年，該叢書持續出版了66期，作品共計47種，涉及作者25人。以國籍而論，“漢學叢書”的作者有6位中國人，1位伊拉克人，1位德國人，1位西班牙人，2位比利時人，14位法國人。以宗教身份而論，作者群體中有不隸會司鐸1人，巴黎外方傳教會司鐸1人，聖母聖心會司鐸2人，其餘21人皆為耶穌會司鐸。只從規模上來講，該叢書在國際漢學的發展史上，就是難以忽視的存在。然而，探討晚清民國時期耶穌會士的漢學研究，不宜僅僅就他們的著作本身

^① 王皓：《徐家匯觀象臺與近代中國氣象學》，《學術月刊》，2017年第9期，第174-184頁。[WANG Hao, "The Observatory of Zikawei and Meteorology in Modern China," *Academic Monthly*, no. 9 (2017): 171-184.]

加以討論，而要將其置於歐洲漢學發展的脈絡中來審視。19世紀後半期的歐洲漢學界，其中心是在巴黎，而中國的“僑居地漢學”則構成了漢學場域的邊緣。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的“僑居地漢學”其主體十分複雜，這些漢學家的身份有外交官、新教傳教士和天主教傳教士等。耶穌會漢學只是其中的一個分支。^① 耶穌會漢學與巴黎漢學中心有着制度性的密切互動，這一點從耶穌會漢學家獲得儒蓮獎（Stanislas Julien prize）的數目就可見一斑。^② 從1875年到1920年，在華耶穌會共獲得10屆儒蓮獎，獲獎作品11種，得獎人數共9人。然而，這些獲獎作品基本都是字典、中國典籍翻譯和目錄等基礎研究，這些研究的工作量大但是深度有限，它們與巴黎漢學中心的高深研究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事實上，一些具體的例子顯示，歐洲的主流漢學界包括沙畹（É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施古德（Gustave Schlegel, 1840-1903）、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等人，在對耶穌會漢學家如顧賽芬（Seraphin Couvreur, 1835-1919）、黃伯祿（1830-1909）和方殿華（Louis Gaillard, 1850-1900）等人的漢學作品進行較為嚴肅的學術評價時，指摘的問題往往不少。^③ 因此，筆者認為，歐洲主流漢學界較為看重的是耶穌會漢學家的基礎研究，他們對耶穌會漢學家給予獎

^① 王皓：《試論十九世紀後期歐洲漢學界的結構和特徵》，《中國文化研究》，2020年夏之卷，第167-180頁。[WANG Hao, "The Configuration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uropean Sinology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Chinese Cultural Research*, no. 2 (2020): 167-180.]

^② 1872年10月26日，法國漢學家、法蘭西科學院（Institut de France）院士儒蓮（Stanislas Julien, 1797—1873）口述遺囑：在其捐贈中一年拿出1500法郎，於法蘭西科學院下屬的金石與銘文學院（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設立一個關於中國研究學術著作的專門獎項，該獎每年頒發一次，是為“儒蓮獎”，它被稱為漢學界的諾貝爾獎。參見王國強：《黃伯祿和徐伯愚——最早獲得儒蓮獎的中國人》，《國際漢學》，2017年第4期，第127-132頁。[WANG Guoqiang, "Pierre Hoang and Etienne Zi: The First Two Chinese Winners of Prix Stanislas Julien," *International Sinology*, no. 4 (2017): 127-132.]

^③ 王皓：《清末耶穌會漢學家與歐洲主流漢學界關係考論》，載《基督宗教研究：第二十五輯》，卓新平主編，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9年，第310-327頁。[WANG Hao, "An Elaboration of the Participation of New Jesuits in Modern Sinology," in *Study of Christianity* 25, ed. ZHUO Xinping (Beijing: China Religious Culture Publisher, 2019), 310-327.]

掖，其中帶有一定的鼓勵性質。^① 在學術生產鏈上，耶穌會漢學和歐洲主流漢學分處上下游的位置，前者努力服從後者的話語主導權並且尋求後者的學術認可，後者則需要前者提供在地性的學術信息和基礎研究成果。歐洲漢學的“邊緣”和“中心”相互倚賴，並且有機地形成了“多元一體”的格局。

耶穌會的漢學研究和文獻收藏活動對中國史學產生的最為顯著的影響，或許可以在陳垣（1880-1971）的宗教史研究中體現出來。然而，這個案例又突出地反映了“影響”本身所具有的複雜性和間接性。陳垣是中國宗教史研究的奠基人。一般而言，要探討外來宗教入華的歷史，對域外文獻、語言和文化的掌握和了解，都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條件。但陳垣是一個基本未曾留洋、不諳外文，而且在青少年時期接受科舉訓練的傳統式學人，卻在也里可溫教、一賜樂業教、火祆教、摩尼教、天主教等外來宗教入華史的領域奠定了現代學術之基，這一事實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史學論題，不能不引起學者的留意並且探尋合乎事理的解釋。筆者發現，陳垣早期的外來宗教史研究與耶穌會漢學和徐家匯藏書樓的典籍收藏有較為密切的關聯。但是，給陳垣提供學術信息和珍稀文獻的並不是外國耶穌會漢學家，而是曾經加入耶穌會的中國天主教耆宿馬相伯（1840-1939）。陳垣與馬相伯之間的關係，又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英斂之（1867-1926）的居間介紹。而陳垣與英斂之的相識，原本也帶有一定的偶然性。^② 從以上粗線條的勾連中，我們可以體會到歷史發展自身所具有的不確定性，而這些不確定性之間的環環相扣，卻為“奠基”之後的中國宗教史研究，提供

^① 王皓：《新耶穌會與法國主流漢學界的互動探析》，《國際漢學》，2019年第3期，第128-137頁。[WANG Hao,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New Jesuits and the Community of French Professional Sinologists," *International Sinology*, no. 3 (2019): 128-137.]

^② 王皓：《陳垣史學與教會因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7年第97期，第87-121頁。[WANG Ha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istorical Studies of Chen Yuan and the Society of Jesus,"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no. 97 (2017): 87-121.]

了確定的基礎。毫無疑問，陳垣是民國時期的史學重鎮，他是當時中國史學界的“中心”之一。在陳垣從政界轉入學界的職業轉型的重要階段，他在學術上以直接和間接的方式吸收了作為歐洲漢學“邊緣”之一的耶穌會漢學資源。耶穌會的漢學研究本來是歐洲漢學研究中的附庸，但是經過陳垣的批判和轉化之後，附庸立即變為重鎮，中國宗教史研究的典範由此生成，後來的學者從此有軌轍可依，至於今日已經蔚為大觀。傳教運動不僅帶動了信仰的傳播，也在客觀上成為知識和學術流通的載體。這一方面體現了“歐洲的邊緣在擾動着中國的中心”，另一方面則辯證地體現了學術之“新和舊”之間的關係。^①

以上三個案例是筆者博士論文的主要內容，限於篇幅，只能做一槪性的介紹，很多歷史的細節和微妙在此不能展開論述。在後來的工作和研究中，筆者發現這三個論題都具有很好的學術拓展性，可以繼續發掘和探討。以氣象學為例，晚清民國時期的耶穌會將現代氣象學引入中國，事實上，這是西洋氣象學的第二次來華。明清之際的耶穌會士已經將當時的西洋氣象學傳入中國，^② 並且在士人階層中引起一定的關注和反響。^③ 弔詭的是，傳教士兩次將西洋氣象學傳入中國，但是未能得到中國社會實質性的重視和反應，傳教士所創立的眾多有關meteorology的漢譯詞匯，現在基本都湮沒在歷史的潮流之中。

^① 王皓：《新耶穌會與近代中西學術》，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2017年博士學位論文，第173頁。[WANG Hao, “Modern Society of Jesus and Modern Scholarship” (PhD diss., Fudan University, 2017), 173.]

^② 王皓：《明清之際西洋氣象知識傳華考略》，《澳門理工學報》，2019年第3期，第97-104頁。[WANG Hao,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Meteorological Knowledge by the Missionaries during the Ming-Qing Transitional Period,” *Revista do Instituto Politécnico de Macau*, no. 3 (2019): 97-104.]

^③ 王皓：《明清之際士人階層對西洋氣象學的容受芻議》，載《思想與文化：第二十七輯》，楊國榮主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21年，第274-292頁。[WANG Hao,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Reception and Adaption of Western Meteorology by the Literati Elites in the Qing Dynasty,” in *Thought & Culture* 27, ed. YANG Guorong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21), 274-292.]

我們現在所使用的“氣象學”，是一個和制漢語詞彙，它的直接來源是我們的東鄰日本。^①再以陳垣研究為例。耶穌會學術資源對陳垣的學術發展有着重要的意義，進而通過陳垣而顯示出對於中國史學的重要意義。實際上，這種關聯是多維度的，對每一個維度的深入探討都有着特別的學術意義。筆者認為，陳垣有關基督教“華化”的思想是民國時期基督教中國化思潮中的一個獨特存在，它的特別之處在於陳垣從來沒有明確提出“基督教華化”或者“基督教中國化”這類口號，但是其思想卻明顯地寄寓在他的中國天主教史研究之中。當時，基督教界很多有識之士為“基督教中國化”奔走呼號，但是大多都是個人性的思想表達。陳垣的“基督教華化”思想，因為他的研究而有着具體和深厚的史實基礎作為支撐，這一點在當時是獨一無二的。^②此外，筆者對中國基督教史進行梳理和回顧，發現一些重要的學術史問題，如“陳垣基督教史研究的揚教心態”問題、“中國也里可溫研究的發展”問題，乃至“陳垣和梁啟超有關玄奘年代的商榷”問題等，都能夠從筆者的博士論文研究引申開來，筆者希望自己接下來的作業能夠多角度和多層次地反映基督教“邊緣”對中國和歐洲學術“中心”的擾動。最後，筆者希望再次指出，這種“擾動”不是類型單一的，而是具有多元性格的。

^① 王皓：《“氣象學”語源考》，未刊稿。[WANG Hao, “The Linguistic Origin of the Chinese Term 氣象學,” unpublished paper.]

^② 王皓：《陳垣的基督教華化思想發微》，《漢學研究》，第37卷第3期（2019年9月），第201-232頁。[WANG Hao, “Interpreting the Thought of Chen Yuan on the Sinicization of Christianity,” *Chinese Studies*, vol. 37, no. 3 (September, 2019): 201-232.]

參考文獻[Bibliography]

西文文獻[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

de la Servière, J. *Histoire de la Mission du Kiang-nan* (Tome II). Chang-hai: Imprimerie de l'Orphelinat de T'ou-sè-wè, 1914.

中文文獻[Works in Chinese]

李天綱：《近二十年中國基督宗教史研究綜述》，《歷史教學問題》，2008年第1期，第42-50頁。[LI Tiangang. "A Review of the Study of History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in the Last Two Decades." *History Research and Teaching*, no. 1(2008): 42-50.]

梁元生：《邊緣與之間》，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LEUNG, Philip Y. S. *Bian yuan yu zhi jian* (Periphery and In-between).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10.]

《申報》，1940年11月28日至12月16日。[*The Shun Pao*, 1940.11.28-12. 16.]

戴麗娟：《周口店發掘時代的一名法國顧問——以新近出版的德日進書信集為基礎材料的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9本第1分（2008年3月），第95-161頁。[TAI Li-chuan. "A French Adviser in the Time of Choukoutien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Study Based on the Recently Published Teilhard de Chardin's Correspondence."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vol. 79, no. 1 (March, 2008): 95-161.]

戴麗娟：《在“邊緣”建立“中心”——法國耶穌會士桑志華與天津北疆博物院》，《輔仁歷史學報》，2009年第24期，第229-256頁。[TAI Li-chuan. "Building the 'Center' on the 'Periphery': The French Jesuit Emile Licent and the Tianjin Musée Hoang Ho Pai Ho." *Historical Inquiry of Fu Jen University*, no. 24 (2009): 229-256.]

戴麗娟：《從徐家匯博物院到震旦博物院——法國耶穌會士在近代中國的自然史研究活動》，《“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84本第2分（2013年6月），第329-385頁。[TAI Li-chuan. "From Zikawei Museum to Heude Museum: The Natural History Research of French Jesuits in Modern China."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vol. 84, no. 2 (June, 2013): 329-385.]

陶飛亞：《邊緣的歷史——基督教與近代中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TAO Feiya. *Bian yuan de li shi* (The Marginal History). Shanghai: Shanghai

- Guji Press, 2005.]
- 王國強：《黃伯祿和徐伯愚——最早獲得儒蓮獎的中國人》，《國際漢學》，2017年第4期，第127-132頁。[WANG Guoqiang. "Pierre Hoang and Etienne Zi: The First Two Chinese Winners of Prix Stanislas Julien." *International Sinology*, no. 4 (2017): 127-132.]
- 王皓：《新耶穌會與近代中西學術》，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2017年博士學位論文。[WANG Hao. "Modern Society of Jesus and Modern Scholarship." PhD diss., Fudan University, 2017.]
- 王皓：《徐家匯觀象臺與近代中國氣象學》，《學術月刊》，2017年第9期，第171-184頁。[WANG Hao. "The Observatory of Zikawei and Meteorology in Modern China." *Academic Monthly*, no. 9 (2017): 171-184.]
- 王皓：《陳垣史學與教會因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7年第97期，第87-121頁。[WANG Ha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istorical Studies of Chen Yuan and the Society of Jesus."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no. 97 (2017): 87-121.]
- 王皓：《清末耶穌會漢學家與歐洲主流漢學界關係考論》，載《基督宗教研究》，第二十五輯，卓新平主編，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9年，第310-327頁。[WANG Hao. "An Elaboration of the Participation of New Jesuits in Modern Sinology." In *Study of Christianity* 25. Edited by ZHUO Xinpings, 310-327. Beijing: China Religious Culture Publisher, 2019.]
- 王皓：《新耶穌會與法國主流漢學界的互動探析》，《國際漢學》，2019年第3期，第128-137頁。[WANG Hao.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New Jesuits and the Community of French Professional Sinologists." *International Sinology*, no. 3 (2019): 128-137.]
- 王皓：《明清之際西洋氣象知識傳華考略》，《澳門理工學報》，2019年第3期，第97-104頁。[WANG Hao.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Meteorological Knowledge by the Missionaries during the Ming-Qing Transitional Period." *Revista do Instituto Politécnico de Macau*, no. 3 (2019): 97-104.]
- 王皓：《陳垣的基督教華化思想發微》，《漢學研究》，第37卷第3期（2019年9月），第201-232頁。[WANG Hao. "Interpreting the Thought of Chen Yuan on the Sincization of Christianity." *Chinese Studies*, vol. 37, no. 3 (September, 2019): 201-232.]
- 王皓：《試論十九世紀後期歐洲漢學界的結構和特徵》，《中國文化研究》，2020年夏之卷，第167-180頁。[WANG Hao. "The Configuration and the

-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uropean Sinology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Chinese Cultural Research*, no. 2 (2020): 167-180.]
- 王皓：《明清之際士人階層對西洋氣象學的容受芻議》，載《思想與文化》，第二十七輯，楊國榮主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21年，第274-292頁。[WANG Hao.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Reception and Adaptation of Western Meteorology by the Literati Elites in the Qing Dynasty.” In *Thought & Culture* 27. Edited by YANG Guorong, 274-292.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21.]
- 吳燕：《科學、利益與歐洲擴張：近代歐洲科學地域擴張背景下的徐家匯觀象臺（1873—1950）》，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WU Yan. *Science, Interest and Expansion of Europe: Zi-ka-wei Observatory (1873-1950) in the Context of the Territorial Expansion of European Modern Science*.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13.]
- 于樹香：《法國“進士”逐夢東方：1914-1938年桑志華（Emile Licent）來華科考探險記》，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YU Shuxiang. *Faguo “jinshi” zhu meng dong fang*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Exploration of Emile Licent in China from 1914 to 1938).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20.]
- 張先清：《小歷史：明清之際的中西文化相遇》，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ZHANG Xianqing. *Xiao li shi* (Tiny History).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